

裴新

美知名性別研究學者帶來平權運動經驗

文■董成瑜（本報記者）

●裴新從女性主義出發，對同志平權、愛滋防治關切很深。（陳建仲／攝）

今年下半年以來，台灣中北部的學術界尤其是性別研究的領域，似乎比以往顯得更有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知名的性別研究學者裴新（Indy Patton）應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邀請，來台擔任一學期的「性／別學術講座」。這幾個月以來，裴新除了在中央大學的固定講座之外，也應邀在中北部各學術單位演講，十二月底她即將返美，由美國費城的天普大學轉到特別為她量身打造研究環境的亞特蘭大艾墨瑞大學任教。

七〇年代會積極參與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和同性戀平權運動的裴新，生長於北卡羅萊納州，大學以前的教育在這裡完成，研究所則在哈佛主修神學，之後做了十年的記者，跑過環保、市政、司法、警政等路線，然後在麻州大學讀傳播學博士。

之所以會成爲一個女性主義者，她說，從小在很開明的教育下長大，玩伴大多是男孩，所以玩的都是男生遊戲，父母對這一點也不擔心。可是到了高中才發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與她的父母想法相同。之前她的數學和科學都唸得很好，可是到了高中，這些都被認爲不該是女孩子讀的科目，於是她對這些科目漸漸失去了興趣。到了大學，這種現象更明顯，此時她開始涉獵更多關於性別政治的東西，那時正好是七〇年代婦運興起的時候。

八〇年代初裴新曾做過的一件有趣的事，是與朋友合辦了一分色情刊物叫《Bad Attitude》（不良態度）。當時許多婦運人士反對色情刊物，認爲是貶抑女性的象徵，但有些人則認爲女人該有自由表達身體的方式，於是當時有一些小型的另類色情刊物出現。裴新與朋友直接接在電腦裡做這些印刷簡單的低成本刊物，有實驗性的色情寫作與圖片，以社區刊物的形式發行，主要訴求對象是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者，兩年內出了六期。

從事愛滋研究的緣起是很個人的。一九八三年她的一個高中同學因愛滋去世，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幾個朋友覺得自己該做些什麼。她住在波士頓，那時的波士頓大約只有五個病例，他們組成一個團體，態度非常激進，開始從官方著手。可是處理有關疾病的議題與其他議題是不同的，他們很快就了解雖然讀過許多資料，但在醫學知識方面仍然不足，他們需要科



學家、醫生來爲他們解釋，他們也從頭了解美國的醫療保險系統與法律條文。這時又有十五個病例出現，當時人們對愛滋的了解十分有限，有些患者被趕出公寓，有些患者因爲醫生開了太多減輕痛苦的藥而藥物中毒……他們每天爲這些混亂的事情奔波。後來組織擴大，每年的預算增加到六百萬元，這個組織的名稱是「The AIDS Action Committee of Massachusetts」（麻

州愛滋行動委員會），而最初的十個參與者，後來有幾人感染愛滋，現在還存活的只剩下三、四個人。

對於台灣的愛滋防治，裴新認爲，台灣傳統的家庭結構太緊密，家庭的看法重於個人的看法，在台灣找不到公共意見的支持，得到愛滋病除了家庭沒有地方求援。她說，同性戀者也是同樣的狀況，因此要公開自己的身分非常困難，至於要一位大學教授公開自己同性戀性傾向則更難。裴新自承是一位同性戀者，因此在美國從事同性戀運動是很個人的原因。從運動轉到學術研究工作，是由於七〇年代後半期，受左派理論影響開始涉獵哲學等領域，嘗試尋找分析美國處境的更好方法，並發表許多論文，是因爲這

樣的情況開始走向學術。她的著作包括：《性與細菌：愛滋的政治》（一九八五）、《做愛：愛滋年代的女性性指南》（一九八七，本書已由婦女新知選譯成中文《愛要怎麼做》）、《發明愛滋》（一九九〇）

）、《最後的勸告》（一九九六）等等。性別政治在多種族的美國社會裡更顯得複雜，裴新說，美國公開的同性戀者通常是白種中產階級，生長在小家庭，幾乎很少住在從小出生的地方，這樣的背景使得他們容易公開自己的性傾向。可是其他種族例如黃種、拉丁、非洲裔的人，他們的社區不願談論這樣的事，在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後，只能向同性戀組織求助，可是這些組織的成員通常又多是白種中產階級，在這裡又難免碰上種族偏見，他們有時會覺得，寧可待在有同性戀恐懼症的社區裡，也不願被這裡的同性戀者歧視。

在台灣與許多年輕人接觸過的裴新說，有一點令她驚訝的是，這半年來，她發現有許多七〇年代之後出生的大學生，已不太記得或是了解所謂「戒嚴時期」，所以當學生說「爲什麼我們不像美國曾經做的那樣做？」她都要再三提醒學生，台灣和美國是不同的。她擔心台灣年輕人把美國的性別政治看得太重要，特別是美國的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所以她總是提醒他們台灣與美國社會與歷史背景的不同。